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是如何

□ 汪 勇

“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奋发图强。

1915年秋，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发出“征友启事”，希望结交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朋友。启事发出后，得到李立三、罗章龙等五六人的响应。罗章龙还和毛泽东通信约见。1918年4月，毛泽东提议成立并主持会务的新民学会在长沙成立，这是一群年青知识分子集合而成的进步团体，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方针，要求会员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通过个人品行的培养，改造个人，进而改造社会。学会成立后，毛泽东主张会员“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走出去锻炼本领，他发起组织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为此，1918年8月毛泽东抵达北京。1919年1月在北京参加了李大钊等指导下的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4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了”。不久，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站在领导湖南学生运动的前列，与彭璜等领导成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开展斗争。12月，毛泽东等领导组织学生罢课，通电全国，发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运动，次年6月驱张运动获得成功。

在参加和领导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初步积累了斗争经验，认识了民众的巨大力量。但他也看到，运动虽然轰轰烈烈，但并未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救国救民必须有科学真理指引。

“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为了探寻真理，毛泽东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时事和社会问题。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新旧思潮相互激荡，他的思想在快速变化中。

1910年秋，在湘乡县立东山学校读书的毛泽东看到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赞同他们君主立宪的主张。次年春，毛泽东考入长沙驻省湘乡中学后，阅览了同盟会的《民立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政治主张。1911年他加入新军，参加辛亥革命，怀着浓厚兴趣讨论了社会改良主义思潮。此后，毛泽东还大量阅读西方著作，接受过进化论和民主思想。这一时期，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甚嚣尘上，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毛泽东，“是自由主义、民权主义、民族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理念的大杂烩”。

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对不同思潮进行了研究和比较。各种主义主张处处碰壁的现实，使他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命运，必须“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找到真正的科学真理进行指引。

“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日趋广泛，毛泽东“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李大钊介绍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他阅读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广泛接触学者，探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他参加北大哲学会、新闻学研究会和“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活动，实地到长辛店调查，了解工厂生产和工人生活状况。1918年的北京之行，是毛泽东的思想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开端。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在斗争实践中，他研究、比较和检验了各种主义学说。1920年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这一次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籍，他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根本转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从此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认识到要根本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奉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秘密开展建党活动。正如他后来对斯诺所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样，毛泽东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中国工人运动的不朽丰碑

——二七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陈茜萍 林友华

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2499号二七纪念馆中央广场，矗立着一座雄伟壮观的二七烈士纪念碑。碑体正面汉白玉上，镌刻着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二七烈士纪念碑”七个镏金大字。碑体正前方，刻有“二七”纪念碑文：

毛泽东两度为二七烈士纪念碑题词

最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两度为二七烈士纪念碑题词。第一次是1956年2月，二七烈士纪念碑在江岸破土动工时，纪念碑筹备委员会决定请毛泽东为纪念碑题写碑名。不久，毛泽东就亲笔题写了“二七革命纪念碑”七个字。这与当初确定的“二七烈士纪念碑”的碑名略有不同。

第二次是在1958年9月，毛泽东来湖北视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把题字的事当面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出于对二七烈士的敬重和对地方工作的支持，欣然同意重新为纪念碑题字。9月16日，毛泽东在离开武汉的船上抽空题写了“二七烈士纪念碑”，并附上致湖北省委的一封信：“敬挥数字，看可用否？谨向烈士们致以敬意。”1958年底，二七烈士纪念碑落成。毛泽东第二次题写的碑名：“二七烈士纪念碑”七个大字就镌刻在碑身正面的汉白玉上。

毛泽东两次为二七烈士纪念碑题词寓意深刻，感人至深，耐人寻味！毛泽东第一次题写“二七革命纪念碑”并非将“烈士”写成了“革命”的笔误，而是对二七斗争性质的认定。早在1923年4月，毛泽东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与工人代表开会时就曾说二七烈士“林祥谦是个坚强的工人领袖，为了革命，牺牲了自己”。

悲壮的二七革命斗争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就把“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运动”确定为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从1922年1月开始，就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3年2月初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就是其顶点。痛心的，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2月7日傍晚，林祥谦不幸被捕。

张厚生用刀逼迫林祥谦下复工令。林祥谦严厉拒绝说：“此事乃全路三万工人生死存亡所系，我分工会非得总工会命令不能开工，头可断，工不可开！”他先后被砍七刀，宁死不屈，壮烈牺牲。那一天是农历十二月廿二，正是家家户户准备过年的时候。他之所以要慷慨赴死，首先想的是全路3万工人，展示了为工人阶级利益不惜舍生取义的革命初心；其次是“总工会命令”，体现了坚强的组织纪律性。

施洋2月7日晚被捕，2月15日大年三十清晨英勇就义。临刑前从容笑说：“我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百万的施洋！”身中二弹，仍高呼“劳工万岁！”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林祥谦、施洋，分别是中国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璧连双辉，光彩夺目。他们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悲壮而绚丽的篇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有党员壮烈捐躯的流血事件是1923年的二七惨案。二七烈士林祥谦、施洋是目前可考的最早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

二七精神浩气长存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初露锋芒的精彩而又悲壮的亮相，先烈用热血铸就的二七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行。

坚定信念、为民谋福。先烈怀着“让劳苦大众都过上好日子”的信念，奋不顾身，义无反顾。施洋是著名的律师，有温馨的家庭、不菲的收入，本来可以过着一种体面而安逸的生活，但他却甘当“贫寒的律师”。他的收入大都用来济贫扶弱，保障人权，伸张公理。林祥谦也全心全意为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东北抗日义勇军兴起、组建和开展武装抗日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领导与帮助。在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的影响和号召下，东北广大民众和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组成反日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工农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等各种形式的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些武装统称为义勇军。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东北抗日义勇军等武装力量的联系。1931年10月起，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先后派遣500余名党团员到各部队义勇军中开展工作。同时还选派得力干部到马占山、王德林等部进行工作，建立党的组织，以实现党的领导与培养骨干。东北各地党组织还动员大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参加义勇军，动员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募捐活动，支援抗日义勇军的斗争。抗日义勇军全盛时期，总人数达到30万以上，以其巨大的规模和波澜壮阔之势予敌以重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各族人民的反日斗争动摇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统治根基。壮怀激烈、荡气回肠的东北抗战是对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生动诠释。

东北抗战是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发端

□ 侯远东

东北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发端。在东北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成为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最坚决的抗击者。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吹响了抗战的第一声号角。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率先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从1931年9月20日到1932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连续发表包括《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在内的十余份宣言和决议，分析和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2年4月，成立还不到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了对外对日战争宣言，这比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早了9年。

地处反日斗争最前线的东北党组织，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即密切关注日本帝国主义的动向。中共满洲省委在1931年4月给中央的报告中详细报告了日本在东北各地驻军、修建军营、工事、进行军事演习以及不断增兵的情况，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要直接占领满洲”。事变爆发的前一个月，满洲特科人员在沈阳南满站等地侦察后得出结论：“看来日本人要动手了”。这些侦察和分析对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作出及时而正确的反应，对于提醒东北各族民众警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起到了重要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满洲省委连续6天不间断地发出抗日救亡的声音。事变后的第二天，满洲省委即召开紧急会

议，并在当天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根源，深刻指出：“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宣言》强调：“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逐出中国！”号召工农兵劳苦群众开展英勇的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宣言》印出后，满洲省委通过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学生迅速散发出去，在广大群众中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斗争精神与勇气，在东北乃至全中国迅速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表现出一个先进政党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

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独立领导了东北抗战。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了东北各地的抗日游击战争。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指出：“要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使这些武装群众的团体变为游击队与工人自卫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东北党组织把创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

为了抓好创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的工作，从1932年开始，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先后派出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到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等地开展工作。到1933年初，由党直接领导的磐石、海龙、巴彦、汤原、珠河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

武装力量。在南满，杨靖宇先后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和海龙工农义勇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游击队在杨靖宇的领导下，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连续粉碎敌人数次围攻，成为日伪统治者的心腹之患。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陆续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这支党领导下的部队共有11个军3万多人，开辟了三大游击区，消灭了大批日伪军，扰乱了日军进攻中国关内的计划，从而延缓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进程。

辽阔的白山黑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直接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东北战场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是东北抗战的政治核心。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指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发表了告群众书，提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广大的革命的工农兵劳苦群众弟兄们携起手来，直接参加伟大的中国革命，消灭日本帝国主义，争取解放！”

东北各地党组织广泛发动各族群众，开展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北满地区，中共哈尔滨市发动中东铁路总工厂、电车厂等工人和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后改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召开反对成立伪满洲国大会，并举行游行示威。在东满，1931



工人谋利益，深受工友拥戴。他在牺牲前的最后遗言是痛斥敌人：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班混账王八蛋的军阀手里！表达了对敌人的仇恨和对“好好的中国”无比憧憬、无限热爱的赤子之心。

严明纪律、团结奋斗。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发出罢工命令后，全路3万多工人一致响应，举行罢工，全路客车货车一律停开，京汉铁路陷入瘫痪。罢工期间，工人们秩序严整，步调一致，坚决执行“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上工”的纪律，表现出京汉铁路工人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团结奋斗的伟大力量。

勇于担当、竭诚奉献。在二七斗争中，许多先烈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抱着奋战到底的决心而慷慨捐躯！尤其是林祥谦与施洋都参加了19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都经历了与阻拦大会召开的反动军警冲突过程，都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但是，他们都丝毫没有畏惧，更没有退缩躲避，他们始终坚持在斗争的最前线，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根本改造社会，个人力量是薄弱的，必须联合同志，共同奋斗。青年毛泽东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他们